



客家文化书系

赖际熙与客家学

赖际熙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卫东 刘丽川 主编

增城区地方志办公室、增城区客家文化研究会 组织
广州市卓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筹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赖际熙与客家学：赖际熙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张卫东，刘丽川
主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7

ISBN 978 - 7 - 218 - 12734 - 7

I. ①赖… II. ①张… ②刘… III. ①客家人—民族文化—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81. 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7767 号

LAI JIXI YU KEJIA XUE : LAI JIXI ZHUANT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赖际熙与客家学：赖际熙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卫东，刘丽川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出版策划：钟 菱

责任编辑：钟 菱 王红星 李春龙

装帧设计：吴长乐 金 彤

责任技编：周 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佛山市迎高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16.5 字 数：235 千

版 次：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 - 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5240



目 录

赖际熙专题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发言	张卫东 / 1
《崇正同人系谱》与客家研究之“回归原典”	曾令存 / 5
从徐旭曾到赖际熙：客家研究的奠基者	谭元亨 / 17
从赖际熙的客家学建构论当前客家学研究方向	刘焕云 / 24
客家学研究的定位与发展	
——基于赖际熙与罗香林的比较	周云水 / 35
从赖际熙到罗香林：客家学的传承	郭真义 / 43
赖际熙与客家学的发生	张应斌 / 51
《崇正同人系谱》学术价值略论	肖文评 许 颖 / 58
试论赖际熙太史之客家观	谢重光 / 69
客家研究的缘起及其意义	熊守清 / 79
试论赖太史的“土客矛盾观”	
——再读《赤溪县志·赤溪开县事纪》	张卫东 / 86
比较视野下的赖际熙客家源流观	张英明 / 99
根在中原：“先民”与“后民”、“先客”与“后客”	
——赖际熙论客家源流试评	张佑周 胡祝英 / 108

客家敬祖重孝会通儒、佛两教探析

——以赖际熙《东莲觉苑祖堂记》为中心 刘道超 / 114

纵横比较，以见《崇正同人系谱·语言》对客家话词语研究的贡献

王李英 / 124

百年客家方言词汇比较研究

——以《崇正同人系谱·语言》为参照 王秋珺 温 冰 / 144

方言书写与文化重塑：民国《赤溪县志·方言》对客家形象的建构

李晓方 刘和富 / 169

一篇旗帜鲜明义无反顾的“隆中对”

——拜读赖际熙《应殿试策》 刘丽川 / 179

赖际熙论客家礼俗

——以《崇正同人系谱》为中心的分析 钟晋兰 / 187

赖际熙与香港崇正总会 周雪香 / 193

赖太史与香港大学的中文教学 施仲谋 / 200

试论赖际熙与台湾客家研究 邱荣举 王保健 / 209

《崇正同人系谱》对《中国族谱研究》的启示和影响 谭赤子 / 217

从赖际熙创建学海书楼的历史文化作用看其现实意义 陈 克 / 229

香港崇正总会与客家族群的价值追求 周建新 / 234

赖际熙为“客家”承先启后 何来美 / 241

赖际熙专题学术研讨会活动报告 陈嵩杰 / 248

酒香也怕巷子深 山高更需引路人

——参加赖际熙专题学术研讨会会有感 罗 鑫 / 251

赖际熙专题学术研讨会闭幕式发言 张卫东 / 255

赖际熙专题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发言

各位学长，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

刚才，增城市政府领导宣布赖际熙专题学术研讨会开幕了。请允许我代表本次研讨会的发起和承办单位说几句话。

首先，请让我们大家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祝贺研讨会开幕！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海内外的与会专家学者！

这次研讨会，是要纪念一位伟大的文化人，时下又称“文化名人”。这位文化名人，在香港很有名，在海外客家学界也很有名，他是增城人，是增江街人，他就是前清翰林赖际熙——赖太史。很遗憾，他在咱们海内客家学界，却不太有名。一段时期以来，客家学界言必称罗香林，而罗香林著作里经常提到赖太史，却没有引起注意。好多客家学者，都到过香港，一般都会拜访香港崇正总会，崇正总会热情款待之后，总会送上一份厚厚的、重重的礼物——装帧朴素、重达两公斤的一函名著《崇正同人系谱》。获赠的学人不少，回来认真拜读、深入研究的人却很少。《崇正同人系谱》放在大堂里随便拿，但有的专家嫌重，没有要。他们都有机会认识赖太史，却与他擦肩而过。

这些年，我们有个感觉，就是客家学界不少人总是有意无意地绕着赖太史走，绕来绕去，绕得自己“转向”了，出现了一些方向性偏差。史学界也有类似遭遇。21世纪初，一位历史学博士、博士后的论文写“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他也绕过赖太史，跟着美国教授走，把局部性问题说成是全局性问题，把非对抗性问题说成是对抗性问题，硬要说“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不止是“西路”，是涉及全省的，应该叫“广东土客大械斗”，它是“不可调和的对立”，演变为大屠杀是必然的，仇恨永远无法消弭，所以要警惕悲剧重

演……企图全面推翻史学界早已公认的定论，形成了从史料剪裁到立论、结论上的一系列硬伤。而史学界公认的这个定论，就是赖太史全面系统调研之后写在《赤溪县志·赤溪开县事纪》里的。

我们纪念赖际熙，就是要读赖际熙，要认真地读，要努力读懂他，理解他，尽情地享受他留下的文化遗产，来丰富和充实我们自己。要读赖际熙，就要做好小学生。第一，要端正学风。有的人还没弄明白原著体例，就开始说三道四，那会是什么结果呢？第二，要提高古文水平。赖际熙的著作，都是文言文，年轻朋友读起来会有点儿困难。然而我们绝不能因为这点儿困难而放弃。我们这次研讨会发起和承办单位的几位老师，平均年龄 70 开外，都甘当小学生。各地不少学者，也都是抱着同样的态度赶来参会的。

赖际熙出道于清末，但他不是个迂腐的旧书生。赖际熙也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他是一个无愧于那个时代的维新变革者，用今天的话说，他也是个“勇于变革的创新型人才”。我们都知道，赖际熙在香港为中华文化“创新”了多个“第一”，在增城编成民国之后的第一部《增城县志》，在赤溪编成了有史以来第一部《赤溪县志》。这累累硕果，正是今天咱们大兴地方文化建设的珍贵资源，是我们发展客家学学科理论构建的珍贵资源。我们不继承，更待何人！此时不继承，更待何时！

作为本次研讨会的发起和承办单位，即增城市人民政府增江街道办事处、增城客家文化研究会和深圳大学客家研究所，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就是本着这一宗旨开展筹办工作的。这一宗旨，得到了中共增城市委与增城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明确指示要办成一个高规格的研讨会，并决定由中共增城市委宣传部、增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这一宗旨，又得到了中国人类学会客家专业委员会、中国客家博物馆、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台湾大学客家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南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大力支持，愿意共同倡议举办这次研讨会，还有广州 1978 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鼎力协办。深圳大学文学院应用语言学实验室以最快速度免费高清扫描了《崇正同人系谱》《荔垞文存》《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历史图录》等重要文献并挂到“增城地情”网上，以解学者手上无原著的燃眉之急。而最关键的，是来自各地学者的热诚与支持 and 快速响应。我们收到的第一篇论文，是广西师范大学 82 岁高龄的客家研究老将熊守清教授，第二篇是广东客家研究

领军人物谭元亨教授。今天到会的学者，有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有来自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正是由于获得如此广泛而有力的鼓励与支持，才有今天研讨会的顺利召开。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本次研讨会的发起和承办单位，再一次向各位领导和各位学长、各位朋友，还有任劳任怨、不辞辛劳的会务组，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张卫东

2014年12月8日

《崇正同人系谱》与客家研究之“回归原典”

曾令存

摘 要：滥觞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于八九十年代后日益成为显学的客家研究，由于复杂的背景，不少“研究”成果一度出现偏离的现象。重新审读与讨论《崇正同人系谱》，思考赖际熙对作为民系与文化的客家的历史内涵的爬疏与解释，在进一步认识赖际熙及其《系谱》于客家研究意义的同时，意欲借此提倡在客家研究中通过“回归原典”，注重学术传承的理念。这其实也是今后建构客家学学科应该具备的一种学术品质与姿态。

关键词：《崇正同人系谱》；客家研究；原典；学术传承

一、“回归原典”的提出与《系谱》

在赖际熙（1865—1937）诞辰150周年前夕、《崇正同人系谱》（以下简称《系谱》）编纂成书并发行近90年之际，重提赖际熙先生及其主编的《系谱》，我以为其中意义不应简单地止于缅怀与重温。作为自谦“旧史官”的赖际熙，当年发起编纂《系谱》，并不曾料想到在其身后七八十年尤其是近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客家”的问题会再次浮出水面，乃至越过文化与学术的边界而成为一门显学，更不会想到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关于“客家”许多问题的“研究”，在“创新”的背后不断发生偏离。赖际熙当年编纂《系谱》，是否纯乎出于联络海外客家民系情谊之构想？我对此是存疑的。虽然发起编纂的崇正总会和赖际熙本人都曾不同程度地谈到了《系谱》“联络情谊”的一面，但从《系谱》内容的编排体例来看，我认为编者试图从历史与学术的高

度解决有关“客家”系列问题的意图其实不言自明，这点从后来学界论及客家研究诸问题时必谈《系谱》亦可以证明。因此，如果我们仅视《系谱》为“崇正同人”联络情谊的社团读物，可谓是对该书意义的低估，也是对我们“旧史官”编纂初衷的一种善意误读。我们今天将赖际熙及其《系谱》作为文化与学术的问题开展研讨，特别是将其置放于“客家”的研究格局中，再次证明《系谱》尽管过去了近百年，但学界始终没有遗忘它，甚至不排除希望能够从中寻找到一些解析当下客家研究中遭遇的诸种疑惑的可能。

而本文之所以从客家研究之“回归原典”角度重新审视《系谱》，与其说是基于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客家研究状况的思考，倒不如说是试图从学术的层面理解与把握《系谱》，领会赖际熙对作为历史、文化与学术对象的“客家”的梳理。这种正本清源的工作，我以为对作为学科的客家研究品质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基于此，在讨论《系谱》之前，有必要对如下相关的若干问题予以阐释。

一是何以在客家研究中提出“回归原典”。这显然与近30年来的客家研究状况分不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沉寂近半个世纪后，客家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再度升温，背景比较复杂，“比如世纪转型时期的新国学研究对除了历史主流文化之外的、包括民族（系）文化与民间文化等的重新梳理与打捞，国家借助文化交流重塑文化大国形象的研究与实践，以及国内近十多年来文化产业的方兴未艾，等等”。因此，近30年来的客家研究，“热闹繁荣的背后显得有些鱼龙混杂，颇有把罗香林（1906—1978）当年努力提升起来的学术性话题重新拉回到坊间的情势，甚至成了一些善于造势的‘学者’跻身‘客家（学）’的标识，误导外界对客家的认识和了解”。基于此，在大陆，“作为一个学派与学科的客家研究，目前仍处在被主流学术圈甄别、认可与接纳的过程中”。^①这种甄别，在众说纷纭、各据一理的今天，回到历史，回到原典，回到问题的源头，我认为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以研究的结论为问题讨论的起点，清理问题提出与演化的历史过程，并揭示出其中被遮蔽的深层断裂或变形节点，以达到对问题研究的纠偏与修复的目的。

^① 曾令存：《客家研究亟待整体提升学术品格》，《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文岭南》2014年2月28日。

“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取代。”^① 这种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式的“知识考古学”，是我们客家研究中提出“回归原典”的理论依据。与此相关联的另一背景，是学科建设层面上的，即通过“回归原典”寻找与提取作为学科建构的客家学的关键词，或者说是学科元素。任何一个学科概念、术语及话语方式的确立，都是该学科在漫长的话语实践中沉淀的结果。而这些概念、术语一旦确立下来，即已自然获得了相对稳定甚至可能是不可替代的内涵，如“客家风俗”“客家方言”“客家民居”“客家饮食”，等等。在客家研究中提出“回归原典”，就学科层面而言，其实是想通过对客家研究史料的学理性爬梳，更好地把握客家学学科内涵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因此，“回归原典”关乎“内容”，如通过回归原典以更科学地把握“客家”的具体内涵；也关乎“形式”，特别是尝试通过回归传统学术，探索作为具有民族学与历史学学科性质的客家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

二是关于“原典”的含义。这里所谓的“原典”，并不是《诗》《书》《礼》《易》等汉以后历朝历代钦定的具有传承文化与教化民风意义的儒藏大典。大致说来，“原典”在本文语境中主要包含两方面的要义：首先是指那些在现代学术语境中被弱化、散佚民间、被视为野史的、不登大雅的诸如州县方志、民间谱牒、区域语言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于民系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们保持了民系文化最原生态的风貌。关于这方面的价值本文在后面还会涉及。其次是指针对某一研究对象在历史上曾经涌现的成果，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与检验，被公认具有一定的学术或史料价值。

三是《系谱》作为本文讨论的“原典”的可能性。首先，从客家研究学术史角度来看，《系谱》发表至今已近 90 年，而且在该研究领域一直以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关注。近百年的历史沉淀，实际上已让《系谱》获得了作为原典必备的时间资质。其次，是与“时间”相关联的《系谱》内容的史料价值。我以为这价值首要体现在《系谱》近百年的时间沉淀，同时更来自于《系谱》材料的采集。对此，《系谱》在编纂凡例中已有形象交代：（《系谱》）“取材自国史、方志、族谱、家乘，以至时贤著作、里乡记载，靡不搜采，片

① [法] 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 页。

言皆有依据……”^①《系谱》存在着分明的二度史料化情形，这无疑增加了其历史的厚重感。在今天，对于客家研究，《系谱》已具有双重证据的价值。

二、《系谱》的编纂因缘与尴尬际遇

《系谱》由当年（1922）香港崇正总会发起编纂。主编赖际熙，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曾为清政府国史馆编修，当年康、梁“公车上书”的积极响应与支持者之一。赖际熙同时还是1921年成立于香港的崇正总会第一至第六届会长、香港大学1927年创立中文系后的首任系主任。赖际熙生平著述，除了《系谱》，还有《清史大臣传》《增城县志》《赤溪县志》等。《系谱》从1922年冬开始着手征集资料，至1925年编纂成书。该书不仅在赖际熙诸多著作中举足轻重，而且也是20世纪客家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系谱》辑释了关于客家民系的八方面内容：源流、氏族、语言、礼俗、选举、人物、艺文、丛谈。

关于该书采用“系谱”体例之缘由，赖际熙曾作如是解释：

谱牒之作，非以标榜阀阅、矜夸博赡也，将使人皆从流溯源，因此知彼，在己无自贬之见，于人无相轻之心……故自古谱牒掌诸史官，其体最尊，其职极重，周礼以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西汉则有帝王年谱，东汉则有邓氏官谱，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南北朝尤重门第，其书转广，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之目，《隋书·经籍志》著录谱系之书至繁，唐诏高士廉、韦挺、岑文本贵天下谱牒，参考史传，修《氏族志》，《新唐书》因有《宰相世系表》……宋欧阳、苏氏出谱学益以明备，旁行斜上，一以周谱为法。后之言谱学者，无能出其范围。沿明迄清，弥崇斯体。^②

实际上，赖际熙在解释系谱体例由来的同时，还隐含着意欲借助中国民间源远流长的谱牒资料对客家民系的历史源流予以梳理的思考。《系谱》第一部分《源流》即开宗明义讨论客家的源流自不待言，其实接下来第二章通过谱牒对一些客家姓氏寻根问祖的《氏族》，在相当程度上仍承担着追溯客家源流的功能，此番用心，持续贯穿于后面的《语言》与《礼俗》两章。

^① 赖际熙主编：《崇正同人系谱·凡例》，香港：学海书楼2000年版。

^② 赖际熙主编：《崇正同人系谱·序》，香港：学海书楼2000年版。

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香港崇正总会在不同时期对《系谱》于客家研究之意义均有所表达,尽管这表达有时难免受当时社会“气场”的冲击而显得有些失之学理性。如1995年《系谱》重印之际,崇正总会时任会长黄石华便认为赖际熙在70年前即有意识对客家文化“首作整理”,是“客家文化发扬的奠基者”;认为赖际熙主编的《系谱》,不仅是崇正总会“唯一重要文献”,亦可谓“客家文化经典著作”,甚至是“全球研究客家文化唯一重要参考书”。^①而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在追溯客家研究的源流时,也会提及《系谱》。如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一章《客家问题的发端》,在谈到客家研究的第三时期(1920—1930)情况时,即认为这一时期的一些客家团体组织发表的宣言,亦包含考述客家源流问题成分,这其中《系谱》颇有代表性。“自是以后,中国学子之言华南各民系者,对于客家始尽变其昔日空论,而多能致力于客家实际问题的探发与著述。”^②罗香林此说,其实暗含了重要信息,即《系谱》正有意识地从关于“客家”的情绪性质的纷争走向严肃、系统的学术证明。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系谱》虽然比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1933)与《客家源流考》(1950)都要早得多,但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客家研究中,赖际熙及其《系谱》的学术影响却远不如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等。撇开后者可谓是20世纪客家研究趋于成熟的标志这一点不论,本文在这里提出这一问题,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困惑。一是历史地看,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客家研究的专门著述并不多,而毋庸讳言的是,赖际熙的《系谱》与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及《客家源流考》,其实均为客家研究的重要著述;二是源于一个悖论,即在客家学界,在梳理近百年的客家研究史过程中,《系谱》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成果;然而,却少有对《系谱》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概言之,《系谱》的学术影响与其学术价值远不相称。

那么原因在哪里?本文尝试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解释,并提出一些思考:

一是可能由于发起编纂《系谱》的崇正总会并非学术性机构。直言之,崇正总会并非是一个学术团体,而是有关客家的一个民间组织。1950年出版

① 黄石华:《崇正同人系谱·重印序言》,赖际熙主编:《崇正同人系谱》,香港崇正总会1995年版。

②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的《香港崇正总会发展史》称：“该《系谱》所以辨析本系迁徙源流与学术道艺，及衣冠文物，所以崇正先报本，团结同人，发扬志业，启示将来，关系至巨，全系人士所共喻也。”《系谱》之编纂，立足（客家）“本系”的意图很明确。这一点罗香林当年在《香港崇正总会碑记》（1950）中对作为香港客家同系（即崇正总会）的性质与宗旨亦有过类似的表述，即“以联络情谊、考证源流、交换智识、共谋公益、振兴工商、实行互助”^①。这种带有同人性质的机构整理编纂出来的著述，容易被人看作是普通的社团读物，而于眼光相对挑剔与苛求的学界，对其权威性与学术性亦多少心存疑惑。

以上说法我们还可从赖际熙在《系谱》编纂缘起的序言中得到印证：

国史以外，益以玉牒。省、郡、州、县皆有志乘，族则有谱，家则有传，以至结社联姻、通家会族，皆纷陈齿录，竞述家风，咏烈诵芬，成为风尚。兹谱之作，无省、郡、县之区分，而会传、志、谱牒之通例，匪云创格，实守成规，相期读此编者，祛其自贬之见，化其相轻之习，振迈远之精神，跻大同之盛轨，则区区楮墨，为不虚矣！^②

赖氏之说，给人一种“言之凿凿”之感。

二是如罗香林所认为的，当时《系谱》印刷数量比较少，外地学者不易见到，所以影响“并不很大”。但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与“声音”来自“港岛”这一特别的地理位置有关。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香港与内地，受政治时局等因素的影响，信息的沟通与学术的交流（尤其是后者）并不像今天那么方便与频繁。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香港，即使除去抗战时期（1937—1941）的“孤岛”岁月，由于其先天的殖民商埠身份及贫弱的学术文化积淀，加之以天然的与内地的隔离（地理上的），来自港岛的“声音”，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内地的回应，我们可以想象。而历史地看，无论是作为民系的客家（人）还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客家（问题），其“主战场”主要还是在内地。有关“客家”的历史事件更是如此，如清道光三十年（1850）的“洪杨事件”（即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六年（1856）发生的广东西路客家人与广府人的大械斗、1905年的黄节“教科书事件”、1930年的广东《建设

① 罗香林：《乙堂文存》，（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增订初版，第104页。

② 赖际熙主编：《崇正同人系谱·序》，香港崇正总会1995年版。

周报》风波等。这种情形，不能不影响到《系谱》的传播与反响。所谓天时地利，于学术研究亦然。《系谱》对客家问题的清理与追溯，在当年的香港乃至海外可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希望内地也能够像香港那样引起巨大反响，基于上面原因，恐怕并不现实。

三是可能与《系谱》采用的谱牒体式有关。这种体式可能产生的两方面情形，在考察《系谱》的学术影响时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这种体式对不了解中国史学传统的读者容易产生错觉，将此皇皇巨著误认为是客家民系一般的家谱汇编。二是如前所说，在现代学术格局中，由于研究观念、理论资源及研究方法的不断进化，特别是西方学术的引介与传播，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些现代学人对中国传统谱乘研究价值的重估，从而制约着他们对《系谱》意义的认识与把握。

除此以外，还有一点，即20世纪80年代以后客家问题的再度升温，并非完全出于学术的原因，而更多为学术之外的动机与利益驱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客家研究历史的传承与纯粹学术的淡漠，影响到了诸如《系谱》之类的成果的传播。

重新估定赖际熙及其《系谱》在客家研究历史中的意义，首先需要面对的是《系谱》自诞生以来的尴尬际遇，而且必须对《系谱》的这一尴尬际遇能够作出相对科学合理的解释。这个问题需要当今客家研究界一起来把脉。本文所作的解释只是一种“大胆假设”，还谈不上“小心求证”。

三、重返历史语境视野下的《系谱》

重新认识《系谱》对于客家研究的意义，必须警惕一段时间以来滥觞于学术研究中的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即主观武断地“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能解决实质问题，也无济于学术常态的建设。“重新认识”在这里应该是与研究对象一次重返历史语境的学理性对话，一种问题意识性质的重新释读，并借此把握和认识研究对象的意义或价值。这种“重返”的“问题意识”的三个关键词是：“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样”。即作者提出思想观点的意图是什么（为了解决什么问题）？作者通过努力对所提出问题解决的程度如何，是否已经解决？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给我们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基于以上这样一种背景，在客家研究的视域下，

我认为《系谱》至少在如下几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是《系谱》整体构架的设计。《系谱》显然借鉴了中国传统地方史志的结构设计，如其中的礼俗、语言、人物、选举、艺文、丛谈等纲目的设置；但又不完全如此，如《系谱》并没有过多考虑地方史志重要的舆地、建置、田赋等方面的内容，而替换补充为中国传统民族史志结构设计中诸如源流与氏族等内容。从民族（民系）史志角度来看《系谱》之于客家研究的贡献，在客家研究史上，赖际熙可以说比较早地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范式建立的角度，设定了作为民族学讨论对象的客家研究的范畴及其大致的内容。这并不是说此前的客家研究著述无视这一问题，实际上包括徐旭曾（1751—1819）的《丰湖杂记》（1808）、黄香铁（1787—1853）的《石窟一徵》（作于清道光、咸丰年间）等也有所涉及。^① 本文想强调的是，只有到赖际熙主编《系谱》的时候，才有意识地对这些问题进行剪裁删补，从民族学研究的角度予以系统化与学理化。赖际熙的这一工作对后来客家研究的影响确是深远的。30年代以后，罗香林以《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等为代表的系列研究的展开，均或多或少地受此影响或启发。^② 就此而言，赖际熙主编的《系谱》可谓是对以往客家“研究”的一次学术性提升，它标志着客家研究学术自觉意识的萌生。这实际上是为后来罗香林系统地全面展开客家研究作了最后的蓄势。在这一点上，充分体现了赖际熙作为一个史学家的高屋建瓴。关于《系谱》在这方面的贡献，我认为过去的客家研究的关注是不够的。篇章结构的设计从来就不只是“形式”的问题，它本身就是“内容”，包含着作者的研究意图与对研究内容的思考等因素。

其次是《系谱》对客家研究中一些问题的“接着说”与“从头说”。通览该书，不难发现编纂者对于“客家”并非停留在一般层面上的简单介绍与描述，而是一种认真严肃的学术考订。《系谱》八方面的内容，对于作为民系的客家研究，均有涉及。而细读《系谱》，可以发现作者在对一些问题看似

① 黄香铁编修的《石窟一征》全九卷：卷一为方域、征抚，卷二、卷三为教养，卷四为礼俗，卷五为天时、日用，卷六为地志，卷七、卷八为方言，卷九为人物、艺文、杂记。

②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全九章：客家研究的发端、客家的源流、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客家的语言、客家的文教（上）、客家的文教（下）、客家的特性、客家与近代中国、客家一般趋势的观察。《客家源流考》四部分：中华民族的构造和演进、中华民族中客家的源流和系统、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客家语言的特征。

“接着说”的同时，还努力“从头说”。以客家源流的问题为例。这是客家研究被关注、讨论得最多，而至今仍存争议的一个问题。即使坚持“南迁说”，长期以来在学界也有不同看法，而客家民系与南方原有土著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更是莫衷一是。《系谱》第一部分论述客家源流，不过 5000 多字，但其中不少观点，与其说是对以往相关研究的简单“接着说”，不如说是在试图“从头说”。兹将《系谱》的有关观点摘录如下，以飨诸方家：

秦时更有中国民族入越，而越族正不必尽禹裔也。然其同为中原世族之遗传，则一也，而非二也。

然赵佗为中国真定人，越族为中国神禹裔，皆客也，非其原民也，客而后衍为越族也。可知吾先民皆本越族拓殖而来，后民则胥由中邦南徙而至。旧典彰彰，可悉数者矣。

先民之来，其最彰明较著者，则为周时之梅𬙊、汉时𬙊将庾胜兄弟。

此吾粤北江之先民，原为越族者也。至唐开元，名相张文献公九龄之族，则以范阳世胄来居曲江。此又中邦明德之裔，而为吾系后民之达人也。而东江后民，则以南齐时程旻之居程乡为最著。

考梅州即松江一带地域，北与汀江壤接，稍西亦与贡江毗连。大抵此间客族所祖，皆由宋南渡再从赣、汀转徙而陆续来者。

魏晋递降，中原多故，于是天堑长江遂不能限北人之飞渡。大抵最著者，厥为东晋之渡江，继而南宋之渡江。而帝昞、帝昺之播迁岭海，其间中原人物之以扈从避乱挈族而南者，遂日来日多……于是中原民族拓殖南方范围弥广矣。此为中世时期之客族。而客之名称，亦至宋初太平兴国年间始著明文于载籍。

盖岭东地域，在东晋、南宋二代，较近首善，田野已辟治，民物已殷繁，而文化输入有年，重以衣冠旧族优秀多才，自得风气之先而发达蓬勃，则族

高望重，其语音因能保存其固有而不为南蛮馱舌所混同。于是岭东之墟，遂由正音而酝有今日吾人之客音也。至于来自南宋者，则其地客音已盛，再传即同化矣。试观今日赣、闽、粤三省毗连之地，言语皆同，可见是即最初一次之客而未经再次之客也。

综观吾系着地之大势，如粤省方面，愈近南则愈少，愈近北则愈多。南、韶、连、循、梅、大埔各地，皆在北鄙，而与中原南陆赣、湘等省壤接毗连，遂为吾系萃处其中。此非由中原南徙而来之确据乎？今日环绕五岭之麓，如赣、汀、南、韶、连各州之吾系民族，乃当日中原南来初经一次为客之民族也，而未再转徙，且已成为今日最先之土著矣，然实则客中之主也。今日梅、循二州与珠江、西江上游及福建潮、琼同系各族，乃皆当日度岭愈南、再经二次为客之民族也；而不复转徙，则亦成为土著矣，然实仍客中之客也。今日增城、东莞、花县、番禺、新安、龙门、从化、清远以及一概插处之客族，乃又近代生齿日繁、人稠地逼，因图发展，更经三次、四次为客之民族也，而转徙不已，又若成为频动之客族矣。是则客中之客而愈客也。而究何者纯为土，何者不为客耶？明乎此，而吾系之本末昭然矣。

其于内地各省，则于官、商二途，名利奔驰，近者复返江之东、西，湖之南、北，远者更入川、陕、滇、黔，源流秩序，皆有可寻。

.....

越族、土著、赵佗、南迁、先民、客民、客家等，都是频繁出现在讨论客家民系源流问题中的关键词（或者说概念、术语）。不过很久以来，这些概念、术语在运用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印象式、空泛化或抽象化的情形。如何将它们置放回具体语境中进行有效解读，以真正有助于我们梳理客家源流，我以为在今天的客家研究中很重要。赖际熙在大中华与大历史的视野中探赜索隐，并试图回答一些在客家研究中至关重要而又容易纠缠不清的问题，便尤为值得我们关注。从源流上说，“客家”称之为由来，以及其民系特性、文化礼俗、语言应用等，乃在于“客”字。客者，后来之谓也。然究竟“后”至何时？若以宋末元初为界，那么之前“南徙而至”的“中原世族”又算什么？其与我们后来称之为“客家”者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而究何者纯为